

读史明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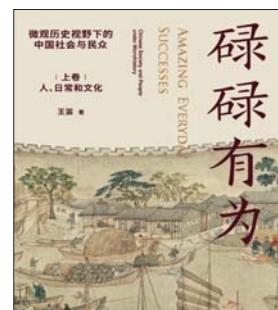
地气满满的微观历史世界

□禾刀

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暑假到成都附近社会实习,在这里,她认识了40多岁的杜二嫂——一个以加工生丝、售卖丝绸谋生的底层农民。次年,她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半个多世纪后,杨树因的论文被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发现,如获至宝,由此打开了一个通向微观历史世界的学术大门,进而“发掘”出大量充满浓厚民间地气的历史信息,并出版了《街头文化》《茶馆》《袍哥》《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消失的古城》《那间街角的茶铺》等多部地气满满、脍炙人口的微观历史著作。

多年来,王笛教授一头扎进社会最底层,从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村和城市的形成、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宗教信仰、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多种维度,仔细打捞沉淀在民间的历史碎片,逐渐还原诸多历史细节。《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下卷“家、群体和法律”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上卷更倾向于底层社会个体,下层则由底层个体逐渐向家庭、族群以及更大社会活动面发展,这也折射出王笛教授的历史研究视角,即历史不是少数个人的独角戏,同时也是下里巴人的叙事。

历史有时就是一开始的不经意,结果被大家仿而效之,久而久之便形成习俗沉淀下来。王笛教授经过梳理发现,今天国人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王笛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对红木家具的膜拜,可能源自郑和下西洋返航用来压舱的红木。作为权力施加的对象,权力的一举一动,有时会成为下里巴人争

相效仿的风向标。轿子原本是官员身份的象征,然而“先富起来”的商人纷纷模仿,终究遍地开花。“1916年,成都有490多家轿行,如果按每家10乘轿子算,总数也接近5000”。抬轿子的虽是下里巴人,但他们创造出“把乘客抬到屋檐一样高”让人惊恐的“拱杆”方式取乐,这无异于以肢体语言对双肩压力的一种戏谑式反叛。

王笛教授的研究最初以四川盆地为中心,许多作品难免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如此前出版的《茶馆》。茶馆不仅是各方信息汇聚的集散地,也是化解纠纷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人情世故表演的重要舞台。四川盆地四周全是山,“长途奔波,最常遇见的就

是劫匪,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州里,都无法完全避免”。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当初出川求学,为求一路安稳,不得不与成群结队的挑夫同行。

不过,历史的影响力从来只有由上至下的单向道,而是相互的,既有上行下效,也有下行上效。这种现象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当数饮食、衣着,乃至“解手”这样当初用来特指后来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过去一些人犯了事,被官府“反绑起来,一个个地被一根绳子串在一起,押解上路。长途跋涉,有人需要小便,只好向官老爷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解手’就成了小便的代名词”。实际上,现在这个词有了新的拓展,不再拘泥于小便内涵,变成了“解大手”和“解小手”,单从字面理解,其义相隔甚远。

王笛教授的写作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每一章前会提出一系列读者可能关心的问题,每章结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梳理、再总结,这种有始有终的写作方式常常能给读者以醍醐灌顶之感。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农业经济中心位于北方,后来之所以向南快速发展,王笛教授指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大量引进的作物,更适应雨水充沛的南方;二是北方边疆屡遭侵犯,百姓不得不一再南迁;三是唐代以后南方水利系统逐渐完善,困扰南方的水患问题得到较大程度解决。

农业离不开水,这也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这一问题,官府的解决方式有时简单得近乎残忍:“几百年前,山西的

农民经常为水争斗。天越旱,斗得越厉害。后来官府以调解纠纷为由,在潭边支起一口滚沸的油锅,放入10枚铜钱,根据双方从锅中取出铜钱的数量,确定双方的分水量”。

人口迁徙是中华文化交融的重要成因。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安史之乱、永嘉之乱、靖康之乱)无一例外均因战乱。迁徙本身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底层民众只能像成都的杜二嫂那样,哪怕在逼仄的空间里,也不放过一丝生存的希望。而“城市生活的繁荣依靠手艺人、小贩和商人”。川滇军阀在成都混战时,一旦战火稍有间歇,街头最早出现的必是小贩的叫卖声。商人的智慧总是超乎想象,“19世纪一位外国人在广州时,看到街道上门窗都是敞开的,屋檐都伸出一截。他同时比较了当时巴黎和广州的街道:在广州的街道上,商贩们本着对顾客充分信任的原则,将商品摆出来给顾客看,让顾客随便挑选,顾客们享受着充分选择的自由;而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商店里,这是不太可能的”。遗憾的是,这样的商业精神并未能因势利导,发展壮大。

透过王笛教授的文字,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既有山川大海,也有纵横阡陌,大人物的叙事无以取代下里巴人的命运悲欢。相较于上层社会经常遭遇的血雨腥风,底层社会的变化则要漫长得多,也细微得多,有的历经岁月淘洗,跨越时空,最终沉淀为公众喜闻乐见的习俗。从这层意义上讲,习俗又何异于一部活历史。

闲闲书话

砌墙党与晒书党

□王淼

砌墙党,指的是不停地买书,却只是为了装点书架,打造壮观的书墙;晒书党,指的是不停地买书,买来就要拍书影,列书单,然后发到朋友圈里“显摆”。很不幸,作为一个资深爱书人,我两党兼而有之,既是砌墙党,又是晒书党。

我的书房不算大,书架是那种图书馆淘汰下来的双面书架,虽然不太美观,却非常实用,每一面都可以装下很多书。早年买书,既不是为了砌墙,也不是为了晒书,而是为了阅读,所以那时买书不太讲究版本,也不追求全套,只买自己喜欢的书与必须读的书。俗话说:“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书不厌多,一直不停地买,但读书是一个慢功夫,只能慢慢消化。这样一来,阅读的节奏远远跟不上买书的节奏,于是,书越聚越多,书架上无处可放,就堆在地板上;地板上无处可放,就塞到书桌下……独自坐在书房里,我常常盯着那些从来没有读过的书发呆,不禁长叹,何时才能将它们全部读完呢?

久而久之,却也渐渐释然了。且不管读与不读,书店还是照逛,书还是照买,读与不读都不重要,把喜欢的书买回家,安顿在自己的书房里,图的就是个心安理得。是啊!读书是一种赏心乐事,买书又何尝不是一种赏心乐事呢?买书就是买书,放在书架上让自己快乐足矣,又何必一定要读呢?精装书适合插架,买;套装书看过去壮观,买;外表好看的书要买;装帧精美的书更要买……砌墙党其实就是这样炼成的。但仅仅砌墙还不够,还要让更多的人看到砌墙的效果,体验“显摆”的快乐——于是,拍照、上传、发圈,忙在其中,乐亦在其中。人生的恋物与虚荣之乐,想必不过如此吧。

砌墙、晒书而呼群结党,可见热衷此道者并不在少数。事实上,砌墙也好,晒书也罢,不过是在网店买书,在微信里晒书,说到底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虽然自得其乐,毕竟缺少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乐趣。网络时代,电商提供了足不出户的便利,却也扼杀了偶然邂逅的机遇——想想看,当你在实体书店里寻寻觅觅时,身边突然出现一位长发美妇,翩若惊鸿,衣香鬓影,于是,翻书的手在微微颤抖,心跳加速,意乱神迷。然而,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人生少了许多可能,终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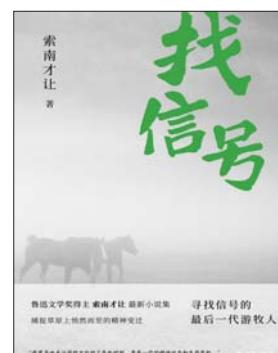
好看小说

寻找信仰的最后一代游牧人

□黄文娟

挖过虫草,做过工人,当过保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兽医的“80后”索南才让,凭着对文学的野心和抱负,成为青海省第一位获得鲁奖的作家。近日,索南才让获奖后的首部小说集《找信号》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书中收录了他的8篇中短篇新作,展现粗粝而真实的自然环境与牧民生活细节,以及时代浪潮中草原上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印记。

草原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体系中耀眼多姿的一个脉络。云朵般的牛羊,如海浪般起伏的草原、飞驰的骏马,是人们对草原的最主要想象,对这些风物的描写,也常常是草原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显见特征。《找信号》作为草原文学硕果,却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种“新”,一方面在于其突出的民族地域色彩,比如粗粝而真实的自然环境与牧民生活细节。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与农耕文明相去甚远的“新”,并不会让其他地域的读者产生隔阂、陌生感。另一方面,作为常年往返于冬牧场、夏牧场,与恶劣天气短兵交接,和茫茫原野四目相对的牧民作家,索南才让的语言似乎也裹挟着牧场的风霜和烈日。《找信号》最珍贵的



《找信号》
索南才让 著
译林出版社

异质性,还在于它对牧民生活、尤其是其内心深处微妙的情感与信仰的刻绘。在索南才让笔下,那一个个在平庸、放纵甚至沉沦中挣扎着寻找救赎,寻求脱离死气沉沉生活而到达更洁净、更纯粹心灵境界的普通牧民,让读者深深为之动容,为之反省。

“最后一代游牧人”的身份使得索南才让的关注点在当下,在牧民的内在精神和心灵:“我更多地关注游牧文化到了危机时刻,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危机。一些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民

族未来产生怀疑与质疑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不确定未来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不是消极,而是变革的必然行为。”

在《找信号》中大放异彩的,就是索南才让关注的“青年一代”。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小说《找信号》,讲述了一群青年人在沙漠中寻找一个牧民遗体的故事,索南才让把寻找遗体的任务和冲突放在没有信号的沙漠这种极限环境中,来展现游牧文化面临现代文明冲击时牧民生活态度的畸形以及对待死亡的方式。小说《和一头牛共进晚餐》《无界的暗夜》则突出了青年牧民与动物的和谐关系,人与动物的动人连接:前者讲述了“我”在鞭打一个不听话的母牛后意外伤了腿,这头被鞭打的母牛救了“我”,“我”因此决定郑重地与它共进晚餐。索南才让借“我”之口批评了牧民重视赛马轻视牛羊的功利态度,又通过人与牛共进晚餐这一看似反常的行为,让人和动物的“互养”关系重新得到彰显;后者则通过主人公宁高对“养一头可可西里公牛”的执着和摩托车给他们家带来的灾难,让现代工业文明对牧民的异化和伤害,与留存在牧人基因中的对血性与野性的渴望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说迷失信仰,给一个部

族带来群体性的惘然和虚无,那么索南才让笔下还有一些年轻人,则体味着失去父亲后更具体、更切身的迷茫、恐惧。在《午夜的黎明》和《无界的暗夜》中,失去父亲的年轻牧人们,或在孤独和脆弱中回忆着父亲在世时的生活片段,重复着父亲的生活习性、动作,或不敢相信父亲的逝去,陷入了不真实感和失重之中。与生理上的湮灭相对应的,是《哲学教授》《找信号》中父亲人格上的倒塌。《哲学教授》中的父亲吹嘘自己在异性面前魅力无穷,却在哲学教授李静到来时,“变得又傻又听话”;此外,部族里上一辈男人们在几十年前犯下的罪恶,在李静的深挖下也完全暴露出来。在《找信号》中,借高利贷后无力偿还的父亲在与儿子大吵一架后失踪,几个年轻人进入信号全无的沙漠寻找失踪者。当荒漠中腐烂得不成样子的父亲被找到后,这些年轻人感到恐惧、慌乱而虚无:“他们站在燥热难耐的公路上,尽量缩小自己的身体……他们两个像两块酥油,正慢慢融化在大地之锅中。”无论是父亲身体的湮灭,还是人格上的倒塌,“失父”后悲伤、脆弱、恐惧、幻灭的年轻人,最终都要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确立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使命。